

## ※書刊評介※

# 現代學術與傳統考據學

——陳尚君教授《全唐文補編》及其相關成果的意義和方法

戴偉華\* 趙小華\*\*

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唐代文學研究有長足的發展：基本典籍、作家別集和研究用書得到了大規模的清理，相當部分作家的生平事蹟、存世作品、文學活動得到進一步考辨，一些複雜的文學現象被放置在廣闊的社會、歷史、文化視角下予以解釋。進入新世紀後，唐代文學的研究在範圍不斷擴大、內涵更趨豐富的良好基礎上，面臨著進一步持續發展和開拓創新的要求。

文獻資料是遺留下來的關於歷史的記載，它為歷史的研究和復原提供了可能，也成為人們尋求歷史知識、窺探歷史風貌、解讀歷史精神的開始和重要手段。古代文學的學科特性決定了文獻資料的文學性和歷史性的統一。因此，作為社會科學研究工作重要基礎的文獻收集、典籍整理、作品輯佚、史事鉤沈，於古代文學的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尤其具有重要意義。

陳寅恪先生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sup>1</sup> 由此可見，「問題意識」和材料發現對於學術研究是何等重要。真問題的產生和出現，無不是對大量原始材料進行細讀精思的結果；真問題的抽繹和解決，更高度依賴對材料的廣泛蒐索和精心考辨。

唐代文學研究要進一步深入，其方方面面，如制度的鉤沈索隱，政治的探幽發覆，文學作品的闡發和研究，基本文學事實的確定和考證，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各個

---

\* 戴偉華，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 趙小華，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助理研究員。

<sup>1</sup> 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503。

層面、與其他藝術門類及精神信仰之間豐富複雜的關係，都離不開相關文獻的記載和資料的整理。陳尚君教授新推出的煌煌三巨冊、近四百萬字的《全唐文補編》<sup>2</sup>，首次對存世典籍和新見文獻中的唐代文章作了全面清理和校訂，采輯範圍遍及四部群書、敦煌遺書、石刻文獻、海外漢籍、佛道兩藏等方面。該書廣蒐博采、精考細訂，可以說是對二十世紀唐代文獻的一次比較全面的清理，更可謂新世紀唐代文學可持續發展的奠基之作。其對唐代文學發展影響之大端，有下述幾方面的表現。

### 一、對傳統文化的打撈和保存：蒐羅輯佚

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之路，充分說明了材料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學界在強調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源自研究方法和學術觀念更新的同時，並不能忽視具有導夫先路之功的材料發現和鑒別。上世紀具有典範意義的甲骨學和敦煌學的建立，其實就離不開甲骨文字和敦煌遺書的發現。王國維先生便以甲骨、敦煌等考古學新發現為基礎走上了釋古的道路。他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提出的：「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sup>3</sup>此新理念一提出，學術界回應者甚眾，不僅對疑古之偏頗有所是正，對二十世紀的學術形成也自有影響。

在唐代文學研究方面，二十世紀新出土和新發現的大量唐代文獻，啟動和深化了唐代文史研究。此前只有石刻墓誌得到了系統整理，分別有周紹良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sup>4</sup>、《唐代墓誌彙編續集》<sup>5</sup>和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sup>6</sup>，收錄以墓誌為主的唐代文章約五千五百篇。相對而言，唐代的其他考古材料和出土文獻的整理工作並不徹底，反映唐代社會生活狀況的各種文字記載，則散佚在浩如煙海的傳世文

<sup>2</sup>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sup>3</sup> 王國維：〈總論〉，《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

<sup>4</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出版。

<sup>5</sup>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出版。

<sup>6</sup>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4年出版。

獻中。

陳尚君教授長期致力於唐代文獻的鉤沈索隱、網羅整理、輯佚補正。他的《全唐詩誤收詩考》（1984年）是清代以來第一次對傳誤唐詩的全面清理；《杜甫為郎離蜀考》（1979年）、《杜甫離蜀後之行止原因新考》（1982年）發前人所未發，「是建國以來研究杜甫生平創作最值得玩味之文」；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辨偽，更是引起唐詩學界和文論學界的極大震撼；他承擔《翰林學士集》、《丹陽集》、《玉臺後集》等三種錄入傅璇琮先生編撰的《唐人選唐詩新編》（1996年）的整理工作；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中承擔了三分之一的內容（約2000條，30萬字），成為撰寫條目最多的作者；參與五十二種《中華野史》的輯錄校點工作（2000年）；輯錄校點《玉堂閒話》等五種《五代史料彙編》（2004年）；並和陶敏先生一起對《唐才子傳校箋》進行全面的檢校、是正，寫成《唐才子傳校箋（五）補正》；擔任《全唐五代詩》主編之一，為該書主要執筆者。對唐宋時期數以千計的大、中、小作家生平，都有程度不等的考訂和創說，其專書研究，偏重於傳世著作的流傳和文本研究、已佚著作的輯佚鉤沈、新出文獻的史料抉發，於子史雜書、唐宋集部諸書，正補頗多。其中對唐代詩文的增補工作（《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建樹頗多，其功甚偉。

隨著唐詩研究領域的拓展與深入，學界對唐詩的全面整理和考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唐詩外編》<sup>7</sup>收錄的佚詩仍未完備，考訂也有不確鑿處，需要進行一次全面的校訂和續補，陳尚君教授獨力承擔了此項工作。他一方面對前人已做的唐詩彙錄輯佚進行系統的總結和梳理，另一方面對唐人著述總目和今存唐宋典籍，作全面的調查。他所查閱的書，其面之廣確實驚人，不只是唐人著述，凡宋元以來的總集、金石、方志、譜牒、說部，以及敦煌文獻、佛道二藏、域外漢籍，都巨細靡遺地加以蒐輯，據他自己估計，先後檢書超過五千種，僅方志就有二千多種。這種竭澤而漁式的網羅，其收穫即為輯得佚詩四千六百多首（其中新見作者八百多人），相當於前此各家所得總和之兩倍多。與此同時，又對《外編》作不少校訂工作，「這樣，就於一九九二年以《全唐詩補編》的名義由中華書局出版，可以說是清代中期以後唐詩輯佚的最大成果」<sup>8</sup>。

<sup>7</sup> 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sup>8</sup> 傅璇琮：《唐代文學叢考·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2。

隨後，陳尚君教授從一九八六年開始著手《全唐文補編》的工作，至一九九一年初步完成，檢錄出唐人遺文六千二百多篇，相當於前人所得唐文總數的四分之一強，其中有大量珍貴而稀見的文獻。該書從初稿交出後到二〇〇五年八月正式出版，十年多時間中兩次排版，三次較大規模校訂，「雖然出版時間大為延後，但也因此得以利用了大量最新發表的珍稀文獻，利用了大量當代傑出學者的研究成績，避免和糾正了因所見文本未能盡善、個人學識局限可能造成的錯誤」<sup>9</sup>。最終輯得唐人文章約七千篇，涉及作家二千六百多人。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中，陳尚君教授還完成了三百多萬字的《舊五代史新輯會證》，該書和《全唐文補編》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推出，是中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

陳尚君教授的著述涉及的具體領域雖然不同，但體現的卻都是在現代學術理念觀照下對傳統文史考據之學的繼承，是在全面占有浩博的古籍文獻基礎上對傳統文化進行清理和保存的努力。如《全唐文補編》關注唐人文章，突破舊有觀念，內容包羅萬象，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補文所據典籍，除別集、總集、史書等與補詩相同以外，大多又另成系統，其難度可想而知。僅據附錄的引用書目可見，作者參考的典籍範圍遍及經、史、子、集中的外國史、時令、方志、載記、金石、天文方術、農書、醫書、道書、書儀等通常不為人們所關注的類別及近現代著作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歷史、政治、經濟、哲學、宗教、美學、文學、藝術、考古等諸多文化領域。對存世典籍，採取逐書檢閱，並逐篇與《全唐文》對核的方式，以免遺漏；對新見文獻和考古資料中的唐代文章更是倍加關注，這就為最大程度地恢復和保存唐代社會面貌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可能。「陳尚君教授所做的工作，就是給歷史研究者『打撈』出了唐、宋之間湮沒、缺失的歷史」。這是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著名學者葛兆光對陳教授學術勞動的評價。

## 二、對傳統文化的整理和尊重：辨偽考證

出於探究事物本來面目和發展過程的需要，人們離不開對研究材料的充分占有和細緻辨別。注重材料的廣泛蒐羅和嚴擇慎取，是乾嘉學風的顯著特點。受其廣泛

<sup>9</sup>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後記》，頁 2426。

影響，二十世紀在文史研究領域取得重大建樹的學者，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垣、陳寅恪、胡適、魯迅、聞一多等，凡立一說，必憑證據；凡引資料，極為審慎。這種求真崇實精神對新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深入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借鑒和啟迪意義。

作為有唐一代（包括五代）文章的總集，《全唐文》編撰由於工程浩大、出自眾手，尚有諸多疏忽，最顯著的有兩條：一是輯錄不注出處，二是網羅尚有不少遺漏。前者最為後世學者詬病，如陳垣先生即云：「且《全上古文》注出處，《全唐文》不注出處，一塌糊塗，殊可笑也。」<sup>10</sup>也確為使用者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後者同治年間古文獻學家陸心源掇拾遺文成《唐文拾遺》七十二卷、《唐文續拾》十六卷，出處逐一寫明，收文約二千五百餘篇，作者近三百一十人，於光緒年間付梓。在校訂上，文字訛誤和重出互見較為突出，並有人名誤、題目誤、收錄誤等現象。小傳敘述亦間有失實。清代考據家勞格深諳唐事，撰有《讀全唐文札記》、《札記續補》共一百三十條，近代唐史名家岑仲勉繼撰《讀全唐文札記》三百一十條，為其糾謬、正誤、質疑，共涉及文章近四百篇，作者一百三十餘人。

「自陸心源去世，至今恰已百年。其間地下石刻的出土，敦煌遺書的發現，秘籍佳拓的面世，域外古逸書的舶歸，皆可謂洋洋大觀，為舉世所關注。未經輯錄的唐文，為數極大。即以石刻一端為例：清末以來新出唐代墓誌，已逾六千；唐碑數量稍少，但史料價值頗高；其他雜刻而存文者，也不下千品」<sup>11</sup>。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陳尚君教授以一人之力、潛心二十年，旁蒐遠紹，爬羅剔抉，編著《全唐文補編》。其書廣蒐博引，可謂集二十世紀唐代文獻之大成。同時作者對《全唐文》及陸補疏失訛誤之處，也作了具體思考，附錄中〈再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及〈讀《唐文拾遺》、《唐文續拾》札記〉二文，便是此研究的相關成果。正因含英咀華，故能夠玄提要。更值得稱道的是，作者雖參閱大量文獻，卻絕非有見必錄，濫加收集，而是在廣泛網羅、收集資料的基礎上嚴擇慎取。無論輯佚、補闕、排纂、還是會校、辨偽、考證，都堅持言必有據、徵而後信。

首先是蒐采十分浩博。據作者在前言、校後記裏的介紹，《全唐文補編》以唐宋四部著作、石刻碑帖、地方文獻、敦煌遺書、佛道二藏為輯錄的主要依據，並對相關情況作了詳細說明。如清人雖也曾檢用存世唐宋四部典籍，但由於披檢較粗，

<sup>10</sup> 陳智超編注，陳垣著：《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70。

<sup>11</sup>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前言》，頁4。

仍有不少遺漏。作者將其與《全唐文》逐一複核，發現即便較常見典籍如兩《唐書》、《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等，亦有頗多的佚文。清末以來新發現之典籍，如《王績》、《張說集》的足本、《王勃集》的幾種殘卷、日本所存弘仁本《文館詞林》、日人所著《文鏡秘府論》、《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存文尤多。對於二十世紀重大發現之一的敦煌遺書中眾多的唐代文獻，目前並無系統整理。陳尚君教授於此下力頗多。他曾通檢《敦煌寶藏》，復據杭州大學古籍所藏縮微膠捲校錄，於英、法及北京所存部分，利用較充分，並曾參考近代以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御制全唐文序〉謂：「予輯《全唐文》之本意，屏斥邪言，昌明正學，……以防流弊，以正人心。」為教化考慮，如釋道偈頌章咒，《全唐詩》以其「本非歌詩之流」而刪，《全唐文》也不取。陳尚君教授則以《大正藏》與《續藏經》為主，大量查閱佛藏，並參用二藏以外之釋書如《祖堂集》、《釋氏六帖》、《神會遺集》及道藏《正統道藏》、《續道藏》等，所獲較多。為避免做重複工作，作者充分利用明清以來金石家 and 現代考古工作的成績，於石刻碑帖則僅據地方金石志及方志收錄墓誌。僅以王勃文章的輯佚為例，即可見其辛勤之殷。王勃的文集，殘佚嚴重。有張燮輯刻十六卷本《王子安集》較通行，清人蔣清翊作《王子安集注》二十卷，皆未收錄日本殘存《王勃集》佚文；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輯有《王子安集佚文》一卷，何林天有《重訂新校王子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都未用全日本殘本。《全唐文補編》以日本正倉院藏唐寫本《王勃集》為底本、以《王子安集佚文》會校，補文二十九篇。其中十八篇為送別、遊宴賦詩所作之序，是其時文人唱和、集體賦詩、交友遊宴等活動狀況的生動寫照。《全唐文補編》中類此的蒐羅輯佚還有很多。這使得我們在掌握了唐代文學發展的全貌之後，有可能對唐代文學發展史及其規律作出更全面一些的解釋。

其次是考證校勘精密。在小傳的撰寫上，《全唐文補編》為每位新見作者補列小傳。凡事蹟所據與所補文出處相同者，小傳不注出處。據他書者，則一律予以說明。小傳記錄作者字里、科第、仕歷、卒年、享壽、著作等，在基本反映了作者生存概況的同時，也提供了不少交友遊歷、歷官始末、著述流傳等資訊。

在文章辨偽方面，《全唐文補編》對於作者、年代、文字、版本諸方面，都仔細梳理源流，辨析因革。對作者有異說者，都通過考辨以定去取，絕非不負責任地有見必錄。如〈淳化閣帖〉將〈投老帖〉、〈去留帖〉誤作何氏書，將〈薄冷帖〉、〈益部帖〉誤作王獻之書，悉予訂正，歸入歐陽詢名下。明閩刻本《文苑英

華》收〈三國論〉缺署名，此文前為王勃〈平臺秘略論〉，《全唐文》據以頂冒誤收王勃名下，《全唐文補編》據中華書局影印本《文苑英華》新編目錄移正至盧照鄰名下；《錄異記》和《全唐文》收〈茅茨賦〉於朱桃椎名下，殆因對原文以隱士自述之口吻理解有誤所致，參《全唐文紀事》移賦於薛稷名下。《會稽掇英總集》署李邕撰《滕偈》，《全唐文》即據之收入，《全唐文補編》據鮑防〈序〉，知此組偈共十一人同作於大曆四年，而李邕卒於天寶中；檢《會稽掇英總集》載浙東聯唱諸詩，知李邕為袁邕之誤。對同名作者的文章歸屬考訂細緻，如〈劾趙彥昭韋嗣立韋安石奏〉為開元二年文，《全唐文》收名臣郭震（字元振）下，考元振開元初貶卒，顯係將二郭震混為一人。此外，詔敕均出臣工之手，節帥奏狀亦多出書記之筆，《全唐文補編》對其作者也盡力一一考知；諸臣奏議見於史乘者，常不載撰人，且多節錄，對部分作者也多方參照，儘量考求。

在文字校錄方面，針對古籍在流傳過程中所發生的誤、脫、衍、倒等文字差異，以及由此引起內容理解分歧的錯訛，全書〈凡例〉及〈前言〉規定：「凡所存文，皆注明所據出處及卷數。據多種出處錄文者，所據皆備錄。一般以首列之書為底本，據次列之書校補。」「錄文時，也力求慎重穩妥，忠實於原出處」。「石刻錄文，因各家所見拓本有早晚、精粗、完殘之別，識別時又有正誤之分，錄文也有很大不同。如昭陵諸碑，今知有錄文之著作即有十餘種，又有多種拓本，如逐一出校，必不勝其繁，徒增篇幅，讀者也不便。有慮於此，本書採取選擇存文較多之一種為底本，參校諸書，錄成一本。如昭陵諸碑，一般以羅氏自刊本《昭陵碑錄》為底本，並參《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等所載錄，以補羅氏僅據一拓之不足，復參取其他文獻，如《姜遐碑》用昭陵新出下半截碑補，《阿史那忠碑》用《寶刻叢編》和《阿史那忠墓誌》補」，為例甚善。校勘時多蒐集善本，使之成為校勘書籍的依據和基礎，才有條件決定取捨。逐字逐句，校其訛奪顛倒，刪補增乙，詳加訂正，這樣校勘的古籍才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全唐文補編》按照援據各種文本（包括宋人典籍之中的徵引和最近發表的羅爾綱《金石萃編校補》中據善拓錄出的少數存文）寫定的《昭陵碑》，可以說是至今為止昭陵碑文錄文最全備的文本。又如《全唐文》收〈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志公之碑〉於闕名下，《全唐文補編》卷二十六據《濟南金石志》補其作者元傘，「然該書有節錄、臆補之病。今僅據以錄他書所無而大致可信之文字，不盡取」。再如作者後記中提到「甘肅炳靈寺的張楚金刻石，先前已用五六種不同的錄文作了校寫」，包括平凡社

一九八六年刊《炳靈寺石窟》、《敦煌學輯刊》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王萬清〈炳靈寺石窟摩崖碑刻題記考釋〉等，「最近發現當地學者張思溫《積石錄》中其親到摩崖下拓錄的文本最為精當，因而將底本作了改換」。皆反映出作者蒐羅文獻的巨集豐富和處理資料的精審。

最後是堅持疑以傳疑，避免武斷。陳尚君教授曾對考據文章的一些傾向性問題（如同一課題的重複研究頗多，所考結論並非新見；或僅憑後出材料，即據以立說；或誤讀文獻，即創為新說）進行過批評，並特別指出「最為普遍的一種傾向，則為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強為立說，不免牽強附會，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爭論」。他堅持以文獻來解決問題。因文獻不足而存疑的問題，可能會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間接材料的發明，得以疑霧盡釋；主張對於那些無新史料發現來證實的問題，仍以存疑為好。「這樣的冷處理很可能不為人贊同，但我覺得較有疑不實之推測，實要謹慎得多」<sup>12</sup>。這種態度在《全唐文補編》中也得到了體現。凡有資料不夠完備或論據說服力有待加強處，作者一律存疑，不妄下論斷。如汪華的〈奉籍歸唐表〉據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彙編》錄文，作者按：「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考定此篇為偽作。」李懷琳〈搏赤猿帖〉據《書史》錄，作者按：「米芾謂〈七賢帖〉皆懷琳偽作。並錄此。〈淳化閣帖〉卷三有山濤〈啟事帖〉、〈汝帖〉卷四有劉伶〈戰國策帖〉、阮咸〈奇異帖〉、向秀〈華嶽帖〉、嵇康〈想雨帖〉、山濤〈魏卿帖〉、王戎〈華陵帖〉。或即懷琳所託者，附識於此，以俟知者。」王鉞〈創建清真寺碑記〉據《陝西金石志補遺》卷上、日本足立喜六《長安史蹟考》第十一章錄，作者按：「日人桑原鷺藏考此碑為明人偽作，見《藝文》一九一二年七期。」張懷瓘〈敘書法〉據《太平御覽》卷七四八錄文，作者按：「此即《法書要錄》卷四〈唐朝叙書錄〉中之一節。〈唐朝叙書錄〉原次懷瓘諸文後，不署作者。未詳《御覽》別有所據，抑沿前而誤，故存以備考。」類似的例子還很多，錄以存疑、錄以備考，體現的是對歷史和事實的尊重。

與《全唐文》相比，《全唐文補編》在收文上下限方面補充了由隋入唐者作文及入宋諸人入宋前文，並補收《全宋文》失錄者文。在文的體認方面，不以內容定去取、僅收已成文者、不收契約文書、書儀變文等；特別注意單文與專著的區別，不收專著，同時也注意不漏收本為單文而曾以一書著錄者，特別是賦、記、序、

<sup>12</sup> 陳尚君：〈文史考據應有所闕疑〉，《文學遺產》，1994年第4期，頁111。



碑、墓誌、銘、贊、行狀等文體；題名、幢記、造像記等以「略存文意」為限；在殘文收錄方面，凡存隻句以上者，皆予收錄。在體例編排上，仿《全唐文》以文從人。以諸帝之文略先於同時之作者，其他以作者生活時代先後為序、以卒年前後為排列的依據；為便於檢索，諸帝詔敕和闕名各體作品按作年先後編列。因此，所收各文，儘量考定其作年。此外，各文題目，儘可能地保持原狀。凡出處無題者，均據原出處或文意擬題，擬題皆分別注明。《全唐文補編》的輯佚辨偽工作在注明出處、蒐訪全備、甄別真偽等方面為古籍整理作了示範。同時，作者在檢閱分析大量的唐宋詩集、文集、詩話、筆記、題跋、考古成果以及後人論述的基礎上自創體例，在正文出處後附以「按」，或說明版本，或辨析舊說，或考別真偽，或闡明新見。而在辨偽考證中，本書對近人研究成果予以廣泛參閱借鏡，批判吸收。最終形成「作者簡介（新見作者）、文章題目、作年、正文、出處、（作者）按」的體例。

陳尚君教授曾經根據學界已形成的共識提出過衡定大型斷代全書學術質量的準繩，包括以下方面：蒐輯追求全備、注明文獻出處、講求用書及版本、錄文準確、備錄異文、甄別真偽互見之作、限定收錄範圍、作者小傳及考按、編次有序<sup>13</sup>。按照這樣的標準衡量，卷帙浩繁《全唐文補編》，不失為一部蒐羅宏富、精於考辨、嚴於取舍的唐五代文總集。

### 三、對現代學術研究的啓示和意義

#### （一）治學方法

文獻資料的蒐集與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工作之一。在此堅實基礎上產生的成果，更有可能是較為科學的。中國治學方式中一以貫之的良好傳統，就是對前代有價值的書籍不斷予以校正和補充。這一傳統的繼承和弘揚，離不開考辨版本、校勘文字、查核史事等傳統文獻研究的基本治學方法——考證。姚鼐曾說：「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證三者之分，異趨而同為不可廢。」<sup>14</sup>可見考據學為

<sup>13</sup> 陳尚君：〈斷代文學全集的學術評價——《全宋詩》成就得失之我見〉，《文匯報》，2004年11月14日；〈斷代文學全集編纂的回顧與展望〉，《四川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sup>14</sup> 〔清〕姚鼐：《惜抱軒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04。

支撐中國傳統文化的三足之一。在具體的操作方法上，為避免材料遷就先入之見，王國維提出「治一學，必先有一預備工夫」。即蒐集材料、考釋材料，強調凡「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sup>15</sup>。有了堅實的考證基礎，他在正史論事之時，或舉事實為證、或以實物為本、或以文獻為據，確實做到了「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sup>16</sup>。陳寅恪也強調在全面把握史料的基礎上，進行嚴格的考訂和選擇。其處理史料，不僅採用乾嘉學派擅長的外考證方法（如校勘、辨偽等），更注意運用實證史學的內考證方法，致力於探求史料寫作人的原意和其所記事實的可信程度。表現在文學研究上，其「以詩證史」的方法在《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對於前代優秀學者的治學方法，如錢大昕先做札記的為學方法、王國維要言不煩的考證、陳寅恪對常見文獻特殊義蘊的發掘、陳垣對史源的重視、余嘉錫講究以目錄治學以及岑仲勉治唐史的廣博而周密等，陳尚君教授發揚光大，他更在幾十年如一日的實際研究中，結合研究課題和自身實踐，逐步形成了極富個性色彩的方法論。

首先，對考證有著強烈的自覺意識和深刻看法。早在發表學位論文的時候，他已經覺察到自己在立論圓通和議論精邃方面的不足，深感長處不在於此，後即在導師朱東潤先生的啟發下走上考據之路。對於考據方法在現代學術研究中地位如何、該如何運用等問題，陳尚君教授有自己獨到的看法，比如他認為梁啟超將乾嘉之學比之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歸結為煩瑣考證，一揚一抑，均失之偏頗。陳尚君云：「所謂乾嘉之學，校正古籍是要確定可信的文本，注疏古籍是求準確地理解文本，小學是為讀經史服務的，辨偽是要剔除古書中竄亂偽托的內容，輯佚是求恢復已亡逸古書的面貌，考證是通過排比歸納、相互比讀，抉發古籍的內蘊，訂正經籍的錯失，凡此之類，今人治國學也不能回避這些工作。」當然，今人治學範圍已經遠遠超出了上述幾端。其中，通過文獻的對讀、比較、排比、推衍、演繹等手段，求得文本或事理真相的考證方法，主要是對文獻進行處理。「凡治國學者，無論其學風取向如何，都應該掌握這一文獻處理的基本技能」。把考證

<sup>15</sup>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觀堂別集》，卷4，頁8，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4冊。

<sup>16</sup> 王國維：〈再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觀堂集林》，卷1，頁16，收入《王國維遺書》，第1冊。

作為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而不是研究的全部，這無疑是圓通而客觀的。因此，在培養學生時，他便只要求學生打好基礎，掌握研究方法（包括考證方法），至於是走研究之路還是考據之路，則據各人的條件，並不滯於一端<sup>17</sup>。

其次，逐步形成了自成系統的考證方法。陳尚君教授的考證方法，可歸納為確定選題、劃定體例、網羅收錄、辨偽考訂、存疑備考等階段，每個階段又各有不同的任務和側重。如確定選題、劃定體例、對資料廣蒐博取等都是在對前人工作的充分瞭解和詳細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的。他做《全唐詩補編》時，先從書志目錄著手調查，重點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唐詩》和補遺諸家如王重民等利用過多少典籍；二是唐人著述的總貌和遺存至今的情況；三是清中葉以後的新出書目。由此初步弄清了前人已用和未用的書目，並發現前人已用書中仍有因披檢疏漏、作者時代或作品歸屬不易確定而失收者，以及明清學者所未見到的與唐詩有關的新典籍。這樣在著手輯詩之初，已有信心能獲得可觀的成績。做《全唐文補編》工作時，也反覆考慮「《全唐文》是怎樣編成的，當時利用了那些典籍，編纂質量如何，加上陸心源所補，唐文還有多少子遺」等問題<sup>18</sup>。為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他寫就了〈述《全唐文》成書經過〉一文<sup>19</sup>，提出許多鮮為人知的史實，對《全唐文》編修過程做了全面考察，所述包括清仁宗倡修該書的起因、當時據為底本而今已失傳的陳邦彥編內府舊本《全唐文》的基本面貌和流傳過程、參與編修的主要人員及承擔之責任、編修過程中利用各類典籍的概況、編修體例之確定及其局限、該書編修不孚眾望的原因、書成後刊校過程及後人所做之補遺工作等。並指出「自清季以來，秘籍善本之面世，海外遺書之回歸，敦煌遺書之刊布，石刻碑版之出土，各種釋藏之印行，《道藏》研究之深入，加上方志譜牒中材料，今可獲見而為《全唐文》失收的唐人文章，當不下萬品。將這些遺文匯錄成書，於唐代文學研究必然大有裨益」。在此基礎上，確定了補錄唐文的工作目標為：總結前人工作的經驗得失，全面覆檢前人已用諸書，充分利用近世以來之新出典籍<sup>20</sup>。

陳尚君教授專注於唐代文獻的考證，力求材料的擴充、完備和精確。從其著述

<sup>17</sup> 陳尚君、劉明浩：〈傳統考據與現代學術——陳尚君教授訪談〉，《學術月刊》，1999年第9期。

<sup>18</sup>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前言》，頁1。

<sup>19</sup> 陳尚君：〈述《全唐文》成書經過〉，《復旦學報》，1995年第3期。

<sup>20</sup>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前言》，頁4。

成就來看，其考證治學方法有兩大特色。第一，做「竭澤而漁」的工作，力求完備。具體表現為：所用材料數量多，如《全唐詩補篇》一百二十萬字，檢書超過五千種，《全唐文補編》四百萬字，所用材料達一千餘種；所用材料種類多，如以唐宋四部著作、石刻碑帖、地方文獻、敦煌遺書、佛道二藏為主，以類書、地理、目錄、傳記、職官、和天文方術為輔，參用雜史、譜錄、醫書、農書、史評和書儀等；所用版本多，如前文提及的昭陵諸碑和張楚金刻石。由於蒐羅的廣泛性和選擇的嚴格性，用版本三種或三種以上，在《全唐文補編》中並不少見，如卷二十六法藏〈致新羅僧義湘書〉所用版本有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真蹟、李基白《韓國上代古文書資料集成》之錄文和《圓宗文類》卷二十二等；卷七十二鄭覃〈進石經狀〉文後出處有《金石續編》卷十一、《關中石刻文字存逸考》卷二、《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十三；卷一〇二劉處讓〈千佛崖題記〉所用版本有《金石苑》卷二、《文物》一九九〇年第六期、《廣元石窟銘文總錄》等。第二，務求第一手材料。如《全唐文補編》確定以唐宋四部著作、石刻碑帖、地方文獻、敦煌遺書、佛道二藏為輯錄的主要依據，固然是為了蒐索更多的資料以補充《全唐文》的缺漏，但也有以上各書於相關原始材料備錄原文、保全者大之故。此外，陳尚君教授還充分利用自己到香港、臺灣、新加坡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學做研究訪問的機會，遍訪域外漢籍和相關書目，購置和複製了大量的相關文獻，對資料的完備性和原始性提出極高要求，使《全唐文補編》在海外漢籍的利用方面獨樹一幟。

此外，陳尚君教授在參與編撰《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時，重點為唐五代中小作家作傳；在《唐才子傳校箋（五）》中，進一步對唐代二千三百多位作家的生平著作進行研究和考訂，是其突破大家研究、理清唐代作家的生平和創作情況治學思想的一次有益嘗試。他的治學歷程由宋入唐，對宋代文獻的熟悉和重視使他超越了許多治唐者。這些治學思想在《全唐文補編》中即以補充新見作者、引用眾多宋代文獻體現了出來。

陳尚君教授的文獻考據成就迴出時流，他總結治學方法為：一是通目錄以求全面系統地占有文獻；二是明史源以做到有層次分主次地使用文獻；三是不盲從前人結論，務必以自己的眼光讀書，根據可靠文獻得出正確、深入的見解<sup>21</sup>。他自己以

<sup>21</sup> 陳尚君、劉明浩：〈傳統考據與現代學術——陳尚君教授訪談〉，《學術月刊》，1999年第9期。

「不成熟的經驗」來謙稱以上方法，學者們都知道他所論雖寥寥，但無一不切中肯綮。

## （二）治學精神

陳垣說：「考證為史學方法之一，欲實事求是，非考證不可。彼畢生從事考證、以為盡史學之能事者固非；薄視考證以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sup>22</sup> 這話雖對史學治學而發，其實對於文學研究者也同樣適用；話中提及的實事求是，即是考證的學術精神之體現。這幾乎也是學者們的共識。如王國維謂：「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sup>23</sup> 陳寅恪認為：「夫考證之業，譬諸積薪，後來者居上，自無膠守所見，一成不變之理……但必發見確實之證據，然後始能改易其主張，不敢固執，亦不敢輕改，惟偏蔽之務去，真理之是從。」<sup>24</sup>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求實精神是學術研究得以順利進行，並最終有所收穫的基本前提之一。

以古代文學而言，其研究材料是早已過去的人物、事件、活動和流傳中變遷不已的文本，學科的特殊性要求學者在研究中，首先應當主要通過歷史考證，而不是理論推衍的方法，來說明各個時期的文學現象。儘可能以真實可靠的材料，來展現創作隊伍的變化、文體的發展、題材的分布、作品的傳播、寫作的時地等文學狀況，並通過對文學面貌的儘量恢復，來分析和認識文學發展進程中的相關規律，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主要任務。現代學者不可能參與過去的文學發展歷史，也不可能在實驗室裏複製歷史場景，只能通過史料去認識歷史、研究歷史。因此考核與鑒別史料的真實性與可靠性是文史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步，離開了大量並經過考核的確鑿史料，就談不上再現歷史真實，談不上恢復歷史的本來面貌，更談不上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成功的文史研究必定以成功的考據為基礎；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過程中，求實是創新的基礎。

正是基於這樣嚴謹求實的作風，陳尚君教授才能做到既尊重前人，又堅持己

<sup>22</sup> 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530。

<sup>23</sup>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觀堂別集》，卷4，頁9，收入《王國維遺書》第4冊。

<sup>24</sup> 陳寅恪：〈三論李唐氏族問題〉，《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304。

見；既嚴格遵循學術規範，又不囿於傳統而自創體例、自出新說。正是基於這樣嚴謹求實的作風，陳尚君教授才不斷追求學術上精進不已的境界：在《唐代墓誌彙編》出版後，他將初稿中所收墓誌做了大幅度的增刪調整；在《全唐文補編》成書後，他沒有放棄廣蒐博采、細心蒐訪的學術習慣，終成《全唐文再補》、《全唐文又再補》，補收文章八百多篇；在《全唐文補編》後記中，他遺憾地指出還有不少應予收錄的文章沒能收錄，留待將來的《唐文待訪錄》以補缺憾；下一步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校訂、《唐五代詩紀事》等工作都按照計劃，已在展開之中<sup>25</sup>。

### （三）文獻考訂

如果說《全唐文補編》對於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論啟示是宏觀而間接的話，其問世將帶動的相關研究的展開和深入，則是具體而直接、並可以預期的。

首先，《全唐文補編》對存世典籍和二十世紀新見文獻中的唐代文章廣蒐博取，其和《全唐文》及系列補遺著作一起呈現了除詩歌外的唐代文學各形式——如賦、記、序、碑、銘、贊、墓誌、祭文、行狀、奏狀等——的發展風貌和演進過程，能夠最接近唐代文學具體發展的原生態面貌。其次，文獻整理和研究不僅僅是學科發展的基礎，而且是專門性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為學界提供有價值的資料及其初步研究的同時，也為作者本人及學界在某方面的深度研究和領域擴展提供了可能。在提供資料方面，新增補的唐代文獻或補新見作者、或輯散佚文章、或考生平經歷、或辨真偽、或糾異文，甚至還可以對已有文獻成果進行補充，其嘉惠學者、乃至澤及後世的意義是顯見的。如筆者在《唐代文學綜論》中曾舉例說明墓誌可補唐詩<sup>26</sup>。《全唐文補編》中墓誌整理較多，對各方面新材料的補充是可以期待的。在研究的深入及領域的開拓方面，陳尚君教授對敦煌遺書中眾多的唐代文獻蒐集尤勤、利用充分，這對於敦煌學的深入發展、唐代俗文學的發展演變研究皆有啟發；他對佛藏文獻的大量查閱蒐索，無疑也為學界闡釋唐代文學與佛教、道教等時代文化思潮的關係提供了更充分的文獻基礎。更具體的例子則來自筆者目前正在進行的「唐代中央文館文士制度研究」課題研究。筆者利用《全唐文補編》，考得新見文館文士如太宗貞觀間著作郎杜寶、高宗咸亨間秘書省著作郎張洵古、武后時校

<sup>25</sup> 參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陳尚君教授訪談錄〉，《中文自學指導》，2006年第1期。

<sup>26</sup> 戴偉華：〈出土文獻與文學〉，《唐代文學綜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書郎杜澄、武后時弘文館大學士兼諸王侍讀崔元悟、玄宗開元間太常博士馮宗及代宗朝秘書正字、廣文博士戴叔倫等幾十人，歷朝歷館皆有補充，這對於文館文士隊伍的完善及文館文士創作、生存狀態的研究都是有益的。此外，筆者對拙著《唐方鎮文職僚佐考》的修訂完善也有賴於《全唐文補編》，這方面的工作正在進行中。

當然，書囊無底，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毫無疏漏，止於至善。陳尚君教授自己在一九九七年的附記中就提到「近年新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獻、新公佈之英藏敦煌文獻、《中華大藏經》、《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中，也頗存唐人遺文，因工作量太大，暫未採擷」。而隨著新資料的陸續出現，《全唐文補編》當然還可以有補充的餘地。二〇〇四年六月，由賀知章撰文的《許臨墓誌》被從牆上起出，此誌可補正史無許臨傳記之缺佚，並為研究賀知章晚年作品提供了新材料<sup>27</sup>。二〇〇四年十月，西北大學博物館披露了徵集到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學生井真成的墓誌。此墓誌記載的內容，在日本文獻中未有相關記載，因此是研究日本古代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第一手資料，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也引起了中日學界的深切關注<sup>28</sup>。二〇〇五年，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研究員王其禕先生將自己收藏的《唐王顥墓誌》披露於世，墓誌所記誌主王顥上下五代共六人姓名均未見載於新、舊《唐書》；誌文撰者張模，《唐書》無載，但據《全唐文》、《隋唐五代墓誌彙編》等所收墓誌來看，張模所撰寫的墓碑、墓誌甚多，其在當時不僅是撰寫碑版文章的大手筆，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書法家；該墓誌銘文作七言歌行體，又可補《全唐詩》之缺佚<sup>29</sup>。唐《姚無陂墓誌》於二〇〇二年在西安出土<sup>30</sup>，《華夏考古》二〇〇五年錄其誌文，把不見於文獻記載的姚無陂其人放到六、七世紀的姚氏家族以及更寬

<sup>27</sup> 韋娜、趙振華：〈賀知章撰許臨墓誌跋〉，《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sup>28</sup> 對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學的生涯的論爭是2004年日本唐代史研究會的主要議題之一。在中國，2005年4月西北大學召開了「唐代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墓誌學術研討會」，研討會論文榮新江的〈從《井真成墓誌》看唐朝對日本遣唐使的禮遇〉、王子今的〈井真成墓誌文試補釋〉，均見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另有葛繼勇的〈唐代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墓誌銘初釋〉，載《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龐博的〈古代中日友好交往的新證實——井真成墓誌與「遣唐使與唐美術展」〉，載《中國文化遺產》，2005年第5期。

<sup>29</sup> 王其禕：〈西安東郊出土唐代《王顥墓誌》疏證〉，《考古與文物》，2005年第2期。

<sup>30</sup>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唐姚無陂墓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12期。

廣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考察，突顯其在隋唐貴族制、科舉制、武則天時期的政治以及對周邊民族關係等研究領域的意義<sup>31</sup>。《李元昌墓誌》記載其事蹟頗詳，對研究初唐時期的歷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sup>32</sup>。

此外，《全唐文補編》卷帙浩繁，如果能將涉及到的作者、人名、官職、地名、重大事件等編訂索引，無疑會更方便讀者對此書的利用檢索。

---

<sup>31</sup> 張學鋒：〈讀西安出土唐姚無陂墓誌〉，《華夏考古》，2005年第2期。

<sup>32</sup> 樊波、舉綱：〈新見唐《李元昌墓誌》考略〉，《考古與文物》，2006年第1期。